

记忆

我忆陈明

□陈漱渝

今年5月20日,手机的朋友圈传来陈明逝世的消息,顿时有一种“故人云散尽”的伤感。在这位103岁的老人面前,我自然属于晚辈,但也自认为是“忘年交”。1992年末,我母亲被送进北京复兴医院的重症病房抢救。她虽有公费医疗待遇,但这巨额的治疗费却无法及时报销,每天都面临“停药”的警告。陈明通过当年中组部负责人解决了这一困难,我们全家一直感念不忘!后来老伴患病,年近九旬的陈老不顾劝阻,坚持前来探视。寒舍在一座老旧的宿舍楼里,无电梯。陈老气喘吁吁爬上三楼的情景至今仍在我眼前闪现。当然,陈老绝非“厚于私而薄于公”,他的重情重义更加体现在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上。1996年,我跟陈老同车去山西长治,参加第七次丁玲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,会议期间又一起去参观位于黄崖洞的八路军军工兵工厂。当我们走到兵工厂旧址门前时,扩音器里播放了《我们在太行山上》这首歌,壮美的旋律让陈老立刻热泪盈眶、激情难抑。我想,此刻他应该是想起了当年演出《扬子江暴风雨》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救亡剧目的情景,应该是想起了他辗转山西奔赴延安的漫漫征途……这位有着83年党龄的老党员,一生经历的坎坷曲折,品尝的酸甜苦辣实在是太多了!

在结识陈明之前,我对他并不了解,后来才知道他跟他13岁的丁玲之间是真爱、互爱,谈不上谁先主动追求谁。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时,丁玲是负责人,称为“主任”,陈明是宣传股长,属于下级。陈明直到神志不太清醒时还反复跟我提起陕北一家饭馆的那个土炕——这是他跟丁玲定情的地方。他对丁玲说:“主任,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。”丁玲反问:“我们两个行不行?”他们热恋时,那个土炕成了他们之间的暗语。丁玲还给他写了一张小条,写的是“北国有佳人”。

1942年春节,陈明跟丁玲结为伉俪。他们相濡以沫的44年当中,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5年和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的7年生活相对平稳,其他岁月多半都是在动荡和困厄中度过的。只消看看丁玲晚年的回忆录《风雪人间》,就能如实了解陈明在丁玲生命中的位置。陈明跟我说,当丁玲蒙冤的时候,他最害怕的就是丁玲丧失信念,

所以走到哪里他们都是手牵着手。

我有一次到木樨地22楼拜访丁玲,她当时左手摔伤,脖子上挂着一块木板,用右手坚持写作。那状态真是文思泉涌、一挥而就。而事后推敲润饰文字的则是陈明。我记得在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一书的原稿上看到过陈明的笔迹。丁玲是大作家,但她称陈明是家里的“改家”。这“改家”改得是否妥帖自然会见仁见智,但丁玲的很多作品中融入了陈明的辛劳和智慧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有老朋友调侃陈明,说他这位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老编剧搞了一辈子,只编了一部为人熟知的电影《六号门》。陈明坦然一笑,并不认为自己为丁玲作了什么了不起的牺牲。

陈明关爱丁玲,当然同时关注丁玲研究。2006年5月6日下午我去看陈明,他一人坐在客厅书桌旁,正对着一本新出的书生气。这书里说,丁玲在延安时期就看破了毛泽东有“帝王思想”,一个证据是毛泽东对丁玲说:“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?”第二个证据是:有一天,毛泽东抱着一个小男孩,那孩子突然撒了一泡尿。毛泽东说:“这是太子尿!”陈老说,延安是抗日根据地,从毛泽东嘴里怎么可能说出“偏安”这两个字呢?延安又不是苟安一方的小朝廷!再说,毛泽东怀抱的并不是自己的



丁玲与陈明



我与丁玲五十年

儿子,怎么可能说什么“太子尿”呢?毛泽东的原话是“全世界都在他胯下”。丁玲的确跟毛泽东开过玩笑,说延安组织系统完善,像个小朝廷,但当时绝对没有“看破”毛泽东有什么“帝王思想”。陈明还一口气列举了这本书的一些其他问题,比如一张四人合影,剪裁后成了两人照。丁玲“文革”时期挨批斗的一张照片,是北大荒宝泉岭农场张廉珠提供的,并不是陈明偷拍的。陈明当时也在挨批斗,怎么可能“偷拍”。

熟悉丁玲的人都知道,1986年丁玲临终之前有一个愿望,就是希望她死后陈明能再找一个老伴,因为陈明这一辈子活得不容易了。后来经人介绍,陈明又找了一个老伴。她就是著名报人张友鸾的女儿张钰。我记得张钰老师原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工作,44岁时丧夫,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,都很优秀;老二是资深编辑,女儿是知名评论家,老三擅长摄影和服装设计。儿女先后成家,各自单立门户,能体会母亲的孤独感,所以都支持母亲跟陈明的“黄昏恋”。老公开发表文章祝贺,老三能够主动为陈明洗脚。张钰老师原是大家闺秀,博学而温婉,既能写书编书,还能做一手好菜,所以陈明再婚之后的确过了一段幸福时光。令人痛心的是,2006年张钰患食道癌,跟疾病抗争了10年,于2016年先于陈明去世。陈明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成了植物人,主要靠妹妹照顾。2015年9月3日,国庆节庆祝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向抗战老战士颁发纪念章,彰显他们的历史功勋。陈明佩戴了这枚紫铜镀金的勋章,但此时他已静静地僵卧在病榻上……

土地与生长

对古圣先贤,若非机缘巧合,我并不会去看他们的纪念馆,也不去拜他们的墓,比如李劫人,他的墓分明就在成都市内,我至今也没去过。拜墓也是一种认识,而我只想读《死水微澜》和《大波》里,去认识那个名叫李劫人的作家,这样更安静。周克芹也是,他去世后回归故土,安埋在简阳城郊,离成都市区只有几十公里,我照样没去过。

不过去一去也真好,于是这回就去了。从周克芹的多部作品里,我知道了沱江,知道了葫芦坝,也知道了葫芦坝的雾和热气腾腾的生活。在我的想象当中,那当是一片水边平畴,田土纵横、屋舍相连,木板房下,人和家畜共居,犬吠声、十犬吠声,一人哭哭、全村皆哭的场景。但眼下农田很少,人户稀疏,满目核桃、柚子、柑橘和南方并不多见的柿子树,小路两旁,凤尾森森,空翠氤氲。且克芹先生的老家并没在坝上,而是与坝紧邻的丘山,他和他的父母都埋在半山台地,上山的石板路,湿润润地铺着厚厚一层竹叶。

知道周克芹这个名字,是念中学的时候。我念书的学校,卧于大巴山南麓一座偏僻的半岛,好在校长爱看电影,过些天,就派学生穿过几里庄稼地,再坐渡船过河,去场镇上背放映机。北影版的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》,就是当年看的。看之前,语文老师说,这电影根据一部小说改编,写小说的人叫周克芹,也是四川人。班上几个文学爱好者就在那里议论开了。其实都还没读过他的作品,议论他,仅仅因为他在四川这个边界之内,尽管他在川西,我们在川东,既属同一省份,便也觉得是“身边人”。心怀梦想者,身边有榜样,是一种福音。后来读赫舍尔的书,赫舍尔说,榜样对一种身份,接受什么样的定义,意味着以什么样的方式确定自己的身份,意味着拿一面镜子端详自己的面孔。周克芹,包括当年在全国崭露头角的巴山作家群,让我们看见自己。

真正读周克芹的小说,是上大学以后。他描述的生活场景,与大巴山区相距甚远,但我很喜欢他的文字。他的文字有一种安静的气质,就是我在他故乡感受到的气质。王祥夫说,四川的周克芹和贵州的何四光,笔下有那个时代所缺少的阴柔之美,这话我很认同。阴柔是一种温润的美、弱质的美、低处的美,也是与土地靠得最近的美。阴柔免不了抒情,加上我们的文学源于诗歌传统,作家大多自带抒情基因,然而小说家抒情是非常危险的事,稍不留意就会变成滥情。在我的阅读视野里,苏联的艾特玛托夫是最能将抒情化为叙述的小说家,张承志因此称他是“伟大的抒情”。周克芹是能高超驾驭抒情的少数中国小说家之一。抒情本身并不难,难的是节制的技巧,节制的技巧也不难,难的是背后的支撑——意思是,你有多少真情。

周克芹是一个特别具有真情的作家。读他的小说,就跟读路遥的小说一样,其议论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,周克芹对自己的明确要求,就是“使思想符合时代”。他们都是介入性很强且有使命感的作家,一旦倾情投入,便可能为情所困,难于洞察。然而,他们的感情是多么真挚,并因真挚而珍贵。两人的气质不同,情感类型也不同,一个滚烫,一个和煦;一个属太阳,一个属月亮。周克芹的文字照耀了你,却不让你感觉到它的照耀。这是弥漫着明亮、忧伤和芳香的文字。芳香来自土地,来自万物,也来自作家自身。自身是源头。他是美的,是美的塑造者。我们常常说一句话,艺术来源于生活,其实还应该说另一句话,生活来源于艺术——美的艺术;没有这后一句,艺术就很难确立自己的价值。事实也证明,我们的生活的确被好的艺术所塑造。

《四川文学》最近刊发了张陵重读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》的札记,张陵在令人信服地梳理和分析后指出,周克芹有良知、有深情、有思想的勇气。正因此,他才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先驱者。良知和思想常被论及,我想说一说是情感——真情实感。老实讲,现在要写一点有真情实感的文字越来越困难了,那种贞静的、谦卑的、不虚饰的文字越来越难得了。而每个写作者回想自己写作的初因,尽管说法各异,最深处其实都是真情。没有理由,就是爱写、想写、需要写。可而今的写作,睁眼闭眼都与“假”碰面。我们在那方镜子里照见的已经不是自己。可怕之处在于,我们以不是自己为荣,并且认为这就是跟上了时代,甚至超越了时代。孟繁华感叹时下缺少有情义的写作,须知真情缺失,哪找情义。

有真情,当然不等于就能写出好作品。这取决于情感的宽度和深度。情感的这两种维度,决定了一个作家的格局,包括思想格局。

周克芹的宽与深,成就于他的文学态度。好几位作家在回忆周克芹时都提到,他有一句话,叫“面对生活,背对文坛”。我不知这话是不是他首创的,刘庆邦说是北京一位作家首先道出的,但不管怎样,周克芹时时将之挂念于心,且以此提醒后进,证明他把它当成了座右铭。他身上有着水样的质地,对生活,他其实不是面对,也不是拥抱,而是融入。他特别珍视自己熟悉的领域,并让自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他悉心辨识自己和生活的韵味,韵味相投的地方,就是他奔赴和用力的地方。为了浸润到那种韵味里,他不惧清贫,甘于寂寞,即使调到省文联,也常回乡蹲点。他非常清楚,尽管走到天南海北都是生活,也都有生活,但那不一定能构成作家的生活,作家的生活和作家要书写的的生活有其内在要求;作家写出了一个大世界,但作家双脚站定的空间,或许“只有邮票那么大”。周克芹的这种态度,与时下某些只到生活中匆匆忙忙索取故事,而不能内化为情感,进而发现生活疑难的所谓深入生活,划清了界限。

三年前,周克芹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纪念会上,我有个发言,说周克芹创作的黄金时期,中国文学百花齐放,百花齐放的意思,有时是繁荣中的迷茫,那么多流派和写法,再坚定的人也容易摇摆,而周克芹充分尊重自己的秉赋,并且始终坚信,无论文学观念如何变化,真情实感、有血有肉,都是文学创作的常识。

此刻,站在先生墓前,回想着读他小说特别是读他风景描写时的动心,深念先生对大地和对文学的痴迷。痴迷是最深的热爱,少了热爱,就少了纯真、赤诚和胸襟,就是茷茷功利,背离初心。我以此检点自己。

访克芹寻初心

□罗伟章



正洲霜影 张明作



藏克芹

诗评家刘士杰走了!又走了一位复旦才子。

今年春节后,听说士杰兄因病已迁居上海,想趁清明时节赴沪扫墓之际,到他的租居处探望一下。早就听说士杰兄是位美食家,在微信朋友圈中,经常发现他在京沪两地的新老字号饭店里的踪影,还看到他在网上晒出来的美味佳肴,他的大腹便便就是如此这般吃出来的吧。我曾警告过他“要管住自己的嘴”,他回说:“不怕,没有三高。”

中午在淮海路吃完午餐,乘车来到士杰的小区住宅,开门一见,他语出惊人:“我住了半个月医院,差一点见不到你了。”我笑道:“依勿要吓人家呀,啥个毛病?”他回道:“肺部感染”。我本想早去早回,可是他不让让我走,在他新租房里整整聊了一个下午,聊复旦老师、同学、友人。他还说:“《诗化心史》7月份再版,出版后一定送你。”他告诉我请谢冕先生写了一篇序言,这篇序将要发表。当着我的面马上给谢冕先生打了电话,告知下月发表的消息,并表示感谢。这天下午,我们交谈的内容,是两人结交几十年最多的一次。最后他拉着我去了一家餐厅,点了六道宁波特色菜。

回京才一个月,就收到他女儿在微信上发的讣告,士杰因肺部感染,于5月3日下午在上海瑞金医院不治身亡。呜呼哀哉,和他同吃的那顿美味的宁波菜竟成了最后的晚餐!

回顾半个多世纪来,我与他同校同系同龄,但低一届,他是64届,我是65届。我们同校5年,却并不相识。

我们相识在1984年,“牵线人”是一位久慕大名但未谋面的“红学家”。当时文学界正在讨论“作家学者化”的问题,为了组织一篇笔谈,想请既是作家又是学者的蒋和森先生谈谈看法。打听到校友刘士杰与

纪念

最后的晚餐

□包立民

蒋先生同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,与蒋先生既是校友,又是同事,可能相熟,于是约他写一篇命题专访。早在复旦求学时代,蒋和森的《红楼梦论稿》就是我们中文系图书馆的“畅销书”,书中一组《红楼梦》人物赞文,成了不少同学口中经常议论的话题。蒋先生的文笔犀利流畅,又像诗一样优美,无形中成了同学们心中的偶像。当我把自己的看法与刘士杰一交流,他十分高兴地说:“蒋先生刚从上海修改长篇小说《冲天记》第二卷回京,他自己就是榜样。既是学者,又是作家,请他谈很好。”《作家,最好也是学者》的专访,很快在《文艺报》刊发,反应良好。

1953年,蒋和森调到《文艺报》工作,正赶上关于《红楼梦》研究的一场大辩论,《文艺报》又是重要战场,于是开始研究《红楼梦》,决心在红学领域闯出一条新路。他埋头写出了《薛宝钗论》《贾宝玉论》《林黛玉论》《略谈曹雪芹的表现艺术》等一系列论文。1959年,这些论文集出版,这就是深受读者欢迎的《红楼梦论稿》。论稿从1959年到1990年,30年间印了三版,在大中学校 and 知识分子群体中反响很大。蒋和森研究《红楼梦》研究了一辈子。1996年临终前,还在病榻上校阅上海古籍书店出版的《名家绘图珍藏全本四大古典小说》清样前言,书中《红楼梦》的“前言”正是由他执笔撰写的。这篇洋洋28000字的“前

言”,竟成了他研究《红楼梦》的绝笔之作。作为一位“红学家”,真可谓始也红楼,终也红楼。《红楼梦》研究,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。刘士杰有感于此,写下了一篇《始也红楼 终也红楼》的悼文,又交我在《文艺报》上发表。说来也巧,蒋和森研究《红楼梦》也始于《文艺报》,最后又在《文艺报》上向广大读者告别。他与《文艺报》的缘分,可说是始有终。

20世纪90年代后期,刘士杰专攻诗评,从论“朦胧诗”的兴起起步,纵览全国诗坛潮涨潮落,评点有代表性的诸多诗人诗作,访谈文化名人,搞得风生水起;而我则由文学转向美术,从书画家的“自画像”入手,广征《百美图》,忙得不亦乐乎。两人很少见面,便相忘于江湖。直到最近几年,才有机缘重新见面。

数年前,几位上海在京的和平中学校友在我家聚会,闲聊中聊起退休后的文娱活动,从同学处第一次听说北京有个评弹联谊会,还定期举办评弹表演,无疑是发现了一个“新大陆”。正是在这位中学同学热情的引领下,我第一次来到三元里的一家咖啡厅,参加评弹活动,在这里,我居然遇到了失联十多年的士杰兄,是一位风流潇洒的英俊小生,怎么变成了大腹便便的蹒跚老人了。我用手指了指他的腹部,笑说“快生了”,他也用手点了点我的肚子说“彼此彼此”。调

侃一番后,互通近况。评弹会上巧遇后,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,交谈的话题从评弹到昆曲。原来士杰兄竟是梨园名票,早在大学时代,他就加入了复旦评弹昆曲社团。分到社科院后,又由恩师赵景深致书引荐,拜识了红学界的前辈俞平伯,还参加了俞先生发起的表演昆曲的团体,居然登台在长安戏院扮演过旦角。据张汉义介绍士杰兄在评弹联谊会中不但表演评弹,还常客串昆曲表演,是联谊会中的骨干“常委”。难怪他能撰述出版专著《中国戏曲史话》,真是一位低调的才子。

也就在士杰兄请我吃“最后的晚餐”前,他一连签名送了我三本大著,除《上海戏曲史话》外,还有《诗化心史》《文化名人访谈与回忆》。在坐高铁回京的途中,我打开文化名人“访谈录”,一看就放不下,在车上几乎把15万字的访谈录都读完了。封面上醒目地列出了访谈的名人,其中多为学界、诗坛上的泰斗名家,诸如钱锺书、俞平伯、艾青、辛笛、何其芳、冯至、张天翼、郑敏、蔡其娇、牛汉、杜运燮等袞袞诸公。士杰兄的专访回忆录,与普通的名人专访大不相同,他的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,除了无法请逝者审阅的文稿,他都要请访问对象审阅、修改文稿,以避免不应有的外误,不仅对访问对象负责,更是对广大读者负责。其二是他的访问对象都是诗人学者,其大家风范、道德文章和高尚人品,也决定了他采写内容的严肃性和高品位。当然,还有一点,士杰兄具有深厚的学养和高超的文笔,否则是不可能写出含金量如此之高的文章的我把这些读后感,在车上的第一时间就用微信告诉了他。可惜的是,作为诗评家,他在社科院文学所精心构筑、安身立命的名山之作《诗化心史》即将出版,可书未出,人却走了。士杰兄呀,你要一路走好!